世紀口號「走向綠色」

陳 安

每天上下班經過的路上，又一座高大公寓樓建成了，一條喜慶竣工的橫幅上特地聲明，此樓將「go green」。

美國俚語中，「go green」的意思是「失信」、「欺騙」。譬如「He went green on me yesterday」，說的就是「他昨天騙了我」。這座新樓當然不是說要誑騙未來的買主。

在這二十一世紀初期，新詞語「go green」已完全擺脫了原來的貶義，而成了美國人的一個響亮口號：「走向綠色！」

這個口號是時代的產物，是針對濫用能源、油價飛漲、環境污染和地球暖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發出的呼籲。走向綠色，已不僅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綠化」、「植樹」，而是有着更深廣的內容，尤其是要求人們具有清醒的能源意識，自覺地去節省燃料，節約用電，節約用水，少用或不用有毒化學品，等等。總之是提倡「綠色的生活方式」，願人們都能在清潔、美麗、安全、舒適的環境中享受人生。

爲了「走向綠色」，目前美國不少城市正在大力倡導「綠化屋頂」，在屋頂上植樹、養草、種花、栽菜。有關專家說，房頂綠化可使建築物隔熱，可減少城市的溫室效應，可使雨水徑流量降到最低程度。如果天氣氣溫爲華氏九十五度，沒有綠化的屋頂表面溫度可高達一百七十五度。這樣的高溫直接影響室內溫度，要用許多能量才能使屋子冷腳。一旦屋頂綠化，頂樓冷氣費用可節省百分之五十，其他層樓也可相應減少。

專家們建議在樓頂可多種景天屬（sedum）植物，如黃花萬年草、佛甲草等，這種植物根淺、耐旱、耐寒、抗風，葉子可以儲水，天旱時可能會變成褐色，但一下雨就又返青。

可以設想一下像紐約這樣樓宇密集、又大多是平頂樓房的城市，一旦樓頂實現了綠化，那將是一個怎樣不同的城市，將會節約多少用於冷卻室溫的熱能和電能。如果乘飛機俯瞰一下這個城市，你看到的將完全是一個綠色的世界：綠色的建築，綠色的街樹，綠色的公園，還有那些漆成綠色的教堂尖頂，——這應該就是「走向綠色」的二十一世紀新城。

一份抗戰烽火中誕生的報紙

——紀念香港《大公報》創辦七十周年

王 鵬

往事鈎沉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天津、上海先後陷落，《大公報》天津版、上海版相繼停刊。《大公報》負責人張季鸞、胡政之、曹谷冰、王芸生、李子寬、張琴南等未雨綢繆，及時決策創辦了漢口版。張季鸞親率報社一部分編輯和經營人員到漢口創辦漢館，曹谷冰、王芸生繼而赴漢；胡政之則暫留上海，繼續處理善後事宜，並研究規劃《大公報》如何繼續創業。胡政之預計，日軍的侵略是無止境的，漢館也不會長久，惟有香港是英國管治地，暫時不會有淪入敵手之虞。無論從國家民族利益着想，從抗戰的需要出發，還是從《大公報》利益着想，都必須另闢蹊徑，創建新的基業。恰在此時，《大公報》從國外訂購了一些捲筒白紙積壓在廣州、香港，也需要有人處理。於是，胡政之派記者張篷舟南下香港，處理捲筒白紙的積壓等棘手問題，並順便考察一下香港的報刊市場，特別是中文報紙的發行問題。

一、籌建和創辦

張篷舟於一九三七年底到香港，迅速解決了捲筒白紙轉運問題，同時詳細了解了報刊特別是中文報紙的市場和發行渠道問題，還給《大公報》漢口版寫了大量的專電和通訊。他及時將考察情況電告胡政之，認爲彈丸之地的香港，中文報紙的發行還是有餘地的，並可輻射中國內地的東南各省以及東南亞各國，但也有人地生疏、港英當局阻撓等困難，利弊兼而有之。隨後，胡政之和張季鸞相繼赴港考察，爲是否創辦香港版做最後的決策。胡政之、張季鸞權衡利弊之後，決定創辦香港版。《大公報》骨幹李子寬、楊歷樵、李純青、王文耀等也迅即到港與張篷舟會合，直接參與港版創辦的籌備工作，後又從漢館調許萱伯到港。他們克服種種困難，辦好了申辦、租房以及勞工局、衛生局的登記手續。一九三八年三月初，胡政之親自到港督陣，爲港版的創刊做最後的努力。館址選在香港皇后大道中三十三號三樓。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大公報》香港版終於創刊了，創刊號繼滬版署一二三四號。一九三八年「八・一三」是上海抗戰一周年紀念日，此日創刊，寓「堅持抗戰、薪火相傳」之意。港版每天出兩大張，共八個版，每版十三欄，定價零售每份港洋三仙，每月六毫；後又增刊《大公晚報》，每天午後出版兩大張。胡政之爲香港《大公報》創刊號撰寫了題爲《本報發行香港的聲明》的社評。社評說：「我們是天津報。幾十年來，南華同胞，本來給過我們不少援助。……自今日起，我們兼發行香港版。此事籌備，已歷數月，今天才得與粵港同胞見面。我們此舉，純因廣東地位異常重要，中國民族解放的艱難大業，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要非常迫切。所以我們便參加到粵港同業的隊伍裡面來，想特別對於港粵及兩廣各地的同胞，與南洋同胞，服務效勞，做一點言論工作。」社評還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這一年的嚴重外患，毀壞了我們國家人民多少事業，本報是民族事業中的渺小一分子，當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獨心不死，人亦未死。雖然備歷艱危，而一枝禿筆，卻始終在手不放。」社評最後說：「當今香港版發行之日，請求香港各界同胞，兩廣各地同胞，以及南洋一帶的僑胞，特別愛護、特別指導，尤其望廣州黨政軍當局常常就近指示我們一些方針。」創刊後幾天，有香港黑社會中人僱用的孩童前來鬧事，他們口出不遜，搶報撕毀，演了一齣鬧劇。胡政之只得請人出面調解，一場風波才得以平息。

港館開辦初期，胡政之工作相當勤苦，運籌大小事務，忙得不亦樂乎。張季鸞經常是把重慶版交給王芸生主持，隻身到港幫助胡政之把握言論。胡政之、張季鸞默契配合，從港館人事佈局下手，配備強有力的編輯班子，確實起到了骨幹的作用。胡政之和張季鸞對手下的編輯記者既愛護有加，又嚴格要求。有一天張季鸞來到報館，對梁厚甫說：「眞是辛苦了，你翻譯的稿子，翻得不錯。今天早上我一口氣讀下去，有如長江大河。」其實，梁不知道，他的這篇翻譯稿質量並不高，同人間頗有微詞。張季鸞是爲了鼓勵他才說這番話的。張季鸞走到寫字枱前，寫了一張條子，回身遞給了梁，說：「我加你每月四十港元的薪金。」當時，梁每月的薪金是六十港元，增加三分之二。他又對梁說：「今天輪到我寫社評，我不想寫了，由你代勞。社評寫好後，交夜班編輯主任。」因張季鸞身體不好，以後梁又替張寫過幾篇社評。據李俠文回憶：「對於青年同事，季鸞先生總是以鼓勵為主，獎掖有加。我寫過一篇有關行政效率的社評，那是當時時髦的話題，我沒有過什麼研究，無非一些書本知識。恰好翌日編輯部同人在資料室開會，他問起這篇社評是誰寫的，並當衆加以讚許。」另據曹世瑛回憶：「香港版的翻譯人員多是報界的新人。有一次，一條英文外電漏掉了一個否定詞『不』。如果對時事有所了解的話，本來可以察覺，結果登了出來。胡政之生氣地說：『頭等報紙，三等翻譯！』為了提高編輯人員的素質，他建立了編輯部座談會，每周一次，由主要編輯、翻譯輪流主持。第一次是他自己，首先回顧一周大事，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然後由大家發表意見。這個活動持續了一段時間。」再有就是胡政之資助副刊編輯蕭乾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系擔任講師，爲蕭日後的記者生涯創造了條件。

圖為港館同人合影（一九四〇年）

香港《大公報》自創刊後，始終堅持宣傳抗戰，揭露賣國行徑，深受讀者的歡迎。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二日，該報獨家登載日汪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原件，並發表社評《揭露亡國的「和平條件」，日閥的毒辣汪兆銘的萬惡》，在社會上和新聞界引起轟動，一時間「洛陽紙貴」。另外，該報的《文藝》副刊，也是吸引讀者的版面。副刊的先後編輯蕭乾、楊剛團結了一大批進步作家，還發表了許多延安作家的作品。據不完全統計，該報副刊《文藝》共發表延安作品一百一十八篇，起到了爲抗戰服務的目的。

儘管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大公報》「文人論政」的辦報風格與這座城市似乎不太相容，但《大公報》本來就很注重報道經濟和社會新聞，因此不難適應這個商業性城市。經過港版同人的努力，發行範圍逐步擴大，曾經達到發行五這個萬份／日。金誠夫在回憶中說：「世界各地，凡有中國使領館、中華會館和中華學校的地方，幾乎沒有一處不是本報港版的直接訂戶。這種情況，為國內任何地點辦報所未有。」由此可見，《大公報》香港版在中國南方沿海和東南亞各國等地都擁有很多讀者。

港版創辦後，《大公報》從內地相繼調來業務骨幹，也招聘了一些新秀入館。他們中有金誠夫、徐鑄成、許君遠、蔣蔭恩、章丹楓、曹世瑛、蕭乾、杜文思、方鉅成、馬廷棟、李俠文、楊剛、梁寬（厚甫）、麥雋曾、麥埃曾、黃達才、黃微華、彭育堂等多人。

爲節約開支，一九四〇年胡政之決定把館址從皇后大道搬至利源東街一幢三層的陳舊木房裡。

二、香港《大公報》被迫暫時停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遭遇敵寇陸海空軍圍攻。九龍先陷，香港本島在敵軍的日夜圍攻之下，飛機大炮之聲不絕於耳。及至十三日，形勢愈見險惡，香港《大公報》只得忍痛停刊。在停刊號上，港館編輯主任徐鑄成撰寫了題爲《暫別香港讀者》的社評，希望與讀者互勉，在任何情況下，保持民族大義和中國人之氣節。文末引文天祥過伶仃洋詩作結：「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香港《大公報》同人居住於羅便臣道及西摩台兩宿舍。有一天，羅便臣道宿舍突中六發炮彈，樓下及二樓各中一枚，毀室而未傷人，一枚中四樓窗外未爆炸，另三枚中屋頂，因建築堅固未炸穿，可謂大幸。二十五日，香港陷落，當時胡政之適亦在港，無法離去，他於棉袍下襟角內，暗藏圓形銅鈕扣三枚，萬一被敵人發覺，即預備吞服，以免受辱。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胡政之冒險乘舢舨渡海後，步行赴惠州，才免遭災難。

就這樣，香港《大公報》在日軍的入侵之下，暫時停刊，它以三年又四個月的辦報經歷，載入了中國現代文化抗戰史、新聞史和大公報史。

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大公報》渝桂兩版同時刊登《本報港版停刊經過》，向國內讀者表達了港館同人與祖國同命運的堅定決心：「我們對於港館前途的危難，本早有預感，所以在一年半前便着手籌設桂館，俾同人有繼續為國服務之崗位；但同時，又因為香港為對外宣傳之重點，非至最後，不能放棄。因此，我們明知港館必遭毀滅，而不能不忍受犧牲，支撐到底。十二月八日，敵寇悍然發動太平洋大戰，香港首當其衝，經十八天的抵抗後，終於淪陷！本報同人，與在港僑胞同歷艱危困苦，幸而今日已先後脫離虎口，回到祖國懷抱來了，而本報的資產損失，則達二百萬元以上！」

這篇《本報港版停刊經過》繼續寫到：「（九龍棄守後）我們為着要在呼吸還自由以前，趕速對社會作一明白交代，便決定於十三日停刊。……在停刊那天的社評中，我們鄭重和讀者告別，說明局勢已到了最後階段，黑暗已將籠罩此孤島，但祖國前途則日見光明，希望大家能珍重自愛，保持清白，使我們每一個僑胞，於曙光照臨此孤島、歡迎祖國之戰士時，衷心毫無愧怍。這幾句話，一面是勉勵僑胞，同時也正是本報同人的自誓，明白向讀者宣誓：我們在任何的折磨威脅下，將決不屈服。」

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才得以復刊，並出版至今。

夏遊阿里山

孫國祥

天南地北

「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國的台灣省遙望，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蕩漾，阿里山林濤在耳邊震響……」這首歌深深地烙在我兒時的記憶裡，今年七月，台灣開放大陸遊客赴台觀光，我終於如願以償地在七月流火的盛夏時節登上了台灣寶島，去了日月潭，遊了阿里山。

那天，高溫難耐，據導遊呂小姐講台灣已有好多天沒下雨了，高高的艷陽如火一般地炙人，大巴蜿蜒地馳行在盤山公路上，車窗外滿是檳榔樹、椰子樹。隨着車子不斷前進，公路不斷抬高，窗外又逐漸換成闊葉樹木，進而又變成細葉喬木，這是由於海拔不斷增高，山上氣溫逐漸下降，生態環境的改變，產生了植物由熱帶林、亞熱帶林到溫帶林的林相變化。這些奇木異樹，在阿里山上匯成一片綠色的海洋。山風勁吹時，山林如驚濤駭浪，發出轟天雷鳴，形成阿里山著名的萬頃林濤。呂小姐說如果春天來到這裡，漫山遍野的櫻花是阿里山又一奇觀，可惜我們來得不是時候，無緣得見，甚是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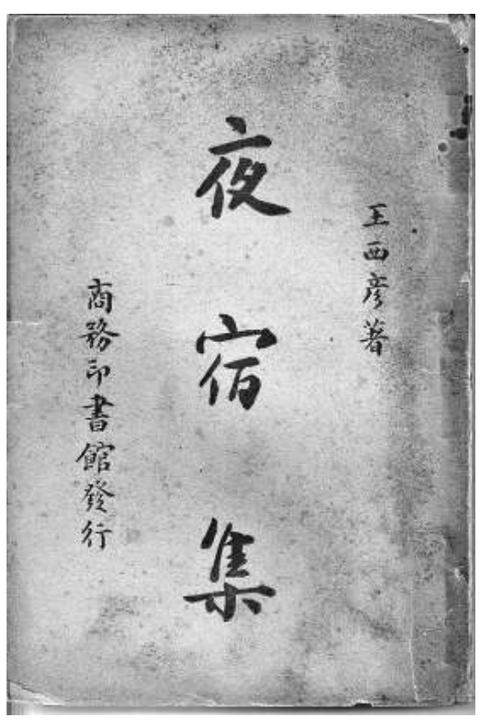
車到阿里山景點入口處時，車內窗已凝結了不少水汽，我們下得車來，車外已經涼氣襲人，太陽被厚重的雲層遮住，出發時洶湧的熱浪早已消失。我們得知，這裡已經海拔二千多米了。遊山時，天上響起了隆隆的雷聲。這雷聲，絲毫沒有影響我們親近阿里山的興致，倒讓我們覺得是阿里山在用特殊的禮儀歡迎我們的造訪，又彷彿是在告訴我們阿里山的由來。

阿里山是台灣中央山脈的一部分，相傳二百五十多年前，台灣原住族鄒族有一位酋長，名叫「阿巴里」，勇敢善獵，由住地達邦翻山越嶺，上山打獵，經常滿載而歸，因念及同族人衣食，常常帶族人入山打獵，每次都收穫頗豐。族人爲感念他，乃將這一帶稱爲「阿里山」。進了阿里山，走進了濃密的原始森林。雷聲越來越大，風起來了，那森林濃密的枝葉在風力的作用下，互相碰撞，發出陣陣如海潮般的濤聲，我終於聽到了阿里山的林濤。此時，那首充滿深情的歌曲竟不知不覺地在我口中輕輕哼起。

雨也來了，雖不兇猛，但卻冰涼冰涼的，把我們這多天來積蓄的暑氣一掃而光。雨滴層層灑落在阿里山的石階上，飄落在湖水裡，滋潤着阿里山，讓人感受到了「天街小雨潤如酥」的意境。雨水打濕了我們穿的棉襖，添加了不少的份量，再加上不斷地登山，身體已有些發熱。此時，棉襖已成了負擔，大家索性脫了，恢復原先的裝束，任憑雨水的澆淋，踩着濕滑的石階，一路前行。

雨遊阿里山，雷聲、雨聲、風聲、林濤聲，聲聲入耳，在這樣難得的境遇裡，我們感到了十二萬分的愜意，沿山而上，順山而下，在茂密的樹林裡穿行，觀賞了兩汪緊緊相依的「姊妹湖」後，進入了阿里山著名的紅檜森林遊覽區。滿山的紅檜樹，生長期百年、甚至千年以上，高大挺拔。我們不時地停下腳步來，帶着驚異的目光，仰起頭，看着那些高聳入雲的紅檜樹。我們看到了樹根奇特的「象鼻樹」，還有在數百年前被砍伐倒地的樹木上，神話般地生長出第二代、五十多年前又在第二代樹幹上長出第三代高大紅檜的「三代木」；我們還見到了久仰的「神木」——在阿里山主峰的神木車站東側，聳立着一棵高凌雲霄的大樹，樹身略傾側，主幹已折斷，但樹梢的分枝卻蒼翠碧綠，樹高五十米左右，十二個人才能合抱。據推算它已有三千多年高齡，約生於周公攝政時代，故被稱爲「周公檜」，是亞洲樹王。站在樹下，我們感歎萬端。三千年，這是何等漫長的一年又一年哪，滄海桑田，寒來暑往，歷史變遷，朝代更迭，它都默默地注視着、承受着，閱盡人間萬象。它不是神，誰能稱神呢？

落日時分我們走出了阿里山森林，此時雨逐漸停了下來，天也漸漸放亮，林濤聲也已漸行漸遠。大巴開動了，阿里山離我們越來越遠，我在心裡默默地祈禱，「再見了，阿里山，祝願你今後好運，林濤聲永遠在山中震響」。



王西彥的《夜宿集》

許定銘

讀書會

雖然王西彥（一九一四至一九九九）擅寫長篇小說，其實他的短篇也有好幾種，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夜宿集》（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四〇）是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內收《夜宿》、《兩姊妹》、《摸秋》、《尋常事》……等十二個短篇。這些都是他一九三三至三六年間所寫的，當時他「從南方一個大都市來到北方一個大都市，在城南一家破陋會館的一間破陋小屋子裡，憑着不愉快的記憶寫下這一些不愉快的故事」（見《前記》）。

我翻閱時見到《摸秋》，不明所以，翻開來看看，見作者有註釋，頗有意思，錄如下：

不知道北方有沒有，我們南方是有這樣的風俗的：在中秋夜裡偷偷地到人家田間去，「摸」一個瓜呀什麼的農作物，拏回家，說是這樣可以使沒有兒子的人生兒子。即使給主人撞見了，也當作沒看見，因為這是俗尚如此。但近年來不成了，窮人家都藉「摸秋」為名，實行竊劫，所以來「摸」取子嗣的人往往不是沒有兒子的人，相反地，卻是些兒女成群的窮鬼了。（頁六十六）

不知這是南方何處的風俗，太平盛世且豐衣足食的時代，是很好玩的，但當戰亂頻頻，民不聊生之際，「摸秋」變成一種「習慣」，那就大大不好玩了！

夢想的力量

陳祖芬

如果世界上沒有戰爭，沒有恐怖，只有友好，只有歡樂，只有撥浪鼓！

如果！

這時一位很老的老太走進我家客廳，看着電視上的美麗的奧林匹克，問：今天是國慶幾周年？

我一愣。也對，今天也是國慶，是檢驗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舉國同慶。

尚天人合一，在當今決不太平的世界，尤其呼喚着融通。

運動員入場，瑞典代表團女運動員一水兒穿着藍色的中國旗袍。我覺得這是各代表團中最美麗的服裝了。雖然這藍旗袍若是放在中國服裝市場，絕不起眼。但是，人家瑞典運動員穿中國旗袍參加開幕式，這是多麼自由的境界。我想起一句話：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看來也不一定。瑞典代表穿旗袍，不是民族的，不過是地球村的，是有大同世界的眼光的。中國隊入場，旗手姚明身旁，走着的是汶川地震的少年英雄。那麼小的一個小孩走在姚巨人的身邊，偏偏走出一份深深的感動。

中華民族就是從深重的災難中走出來的。二〇〇八年，我們走出冰雪，走出地震，走出水災。因爲我們有夢想的力量和物質的力量，因爲，我們有改革開放三十年積聚的力量。

開幕式結束前，照例要唱奧林匹克會歌。中國童聲合唱的希臘歌曲，把我帶往一八九六年的希臘第一屆奧運會。希臘文化的人本主義與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同是人類文明的源頭。

開幕式，既把奧運精神濃縮進一個鳥巢，又是奧運精神的最大化。

看奧運，感受夢想的力量。

洶湧的焰火，向鳥巢上方噴礴而出，好像要帶着鳥巢帶着夢想，飛翔。那是夢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dream，是亞特蘭大二十六屆奧運會上，席琳・迪翁唱響的歌。此刻我看到夢想激發的力量，和力量升騰的夢想。

看着這滿天的焰火滿天的色彩總動員，我不知道今晚是不是把全世界的色彩都用到這裡來了？

鳥巢就像一顆巨大的心臟，搏動着全中國人民的心跳，搏動着在電視機前收看奧運開幕式的全世界大約四十億人的心跳。這幾年，我們習慣了奧運倒計時。但到了七日，到了八日，我們以小時來倒計時的時候，反而覺得，我們等得太久，太久！畢竟，我們從八國聯軍踏進北京，到一百零二位國家和地區元首、領導人齊聚集京城，我們經歷了怎樣的苦難怎樣的艱辛怎樣的摸索怎樣的大落大起?!

終於等到了八日的晚八點零八分。我在觀衆席裡，第一眼看到了，是一個外國小男孩使勁搖動中國的撥浪鼓玩。眞想給全世界每一個孩子，都送一個中國的撥浪鼓。

文萊海濱老人

許寒山

域外漫筆

郵輪停靠在文萊首都斯里巴加灣的海港。因有大半天的空閒時間，打聽到不遠處有一片非常棒的沙灘，我們四個船員便相約去玩。

我們想截出租車，可少有的幾輛都是捲着一股熱浪飛馳而過。待在路邊的熱帶植物樹蔭下，我們心裡多少有點掃興。正在這時，一輛明顯破舊的老爺車駛近我們的身邊停下了。一個老頭從車窗裡伸出了腦袋：「去沙灘嗎？我送你們！」。我們應答：「是的。多少錢？」「順路。不收錢！」對方說。有人嘀咕，不會是黑車吧？也有人說，難道怕一個小老頭把我們四個給宰了？

上車了，破舊的車子被我們擠得咯吱咯吱地響。老頭朝我們點了一下頭，便發動車子前行了。我們發現，老頭花白的鬍子挺硬，有一寸來長，像鋼絲刷。看着老頭頗有特點的容貌，我們幾個想笑，但沒敢。老頭話不多，只是問了我們一句：「是菲律賓人？台灣人？」我們回答：「中國人！」對方隨即豎起了右手的大拇指。

十來分鐘光景，到了。我掏出了兩張在港口剛剛兌換的當地紙幣，老頭一下子生氣了：「怎麼？小看人？」我們當然作罷，向他道謝後便直奔沙灘去了。

傍晚時分，我們要返回港口。和來時的情況差不多，依然截不到出租車。可就在這檔口，那老頭又開着他的老爺車來了。依然，傍着我們的身邊停下了。我們詫異——這一次，不會又是順路吧！

老人開口了：「順路。上車吧！」

我們的心情有一點兒異樣，但大家都沒說話。默默地上了車，默默地，讓老人將我們載回了港口。

下車時，我們沒敢提錢，只是目送了他。我們注意到，老人掉轉車頭後，返身又朝沙灘方向開去了。

港口的一名熱心門衛看到了我們和老人道別的情形，他用馬來語說了老人的一點情況：老人唯一的兒子是在國外坐的士時被撞身亡的。

之後，他便常常駕着他的車，在這裡默默地幫助着各地的船員、遊客……

——這是我的一位在外籍郵輪上當海員的青年朋友講給我聽的。我注意到，在講這件事時，青年朋友的眼睛裡分明透出了一些晶亮的東西。